

就业形势和展望：形成中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蔡昉 王美艳 王德文

工作论文系列八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

2001年3月

就业形势和展望：形成中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蔡昉 王美艳 王德文

在拥有 12.7 亿人口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否使劳动力得以比较充分地就业，不仅决定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仅如此，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经验还表明，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把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评价放到一个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的分析框架中进行。通过对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我们试图揭示出决定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以及阻碍就业增长的制度性障碍。

一、就业形势与劳动力市场状况

改革以来中国就业状况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趋势。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就业增长迅速，且三次产业的就业数量都在增长。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就业增长有所减缓，农业就业绝对数量减少，非农产业就业仍然增长较快。90 年代后期以来国民经济就业状况显示出恶化趋势，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企业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就业人数或下降或增长缓慢。但三次产业显示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农业就业趋于徘徊，第三产业就业持续增长，而工业就业有些年份绝对减少（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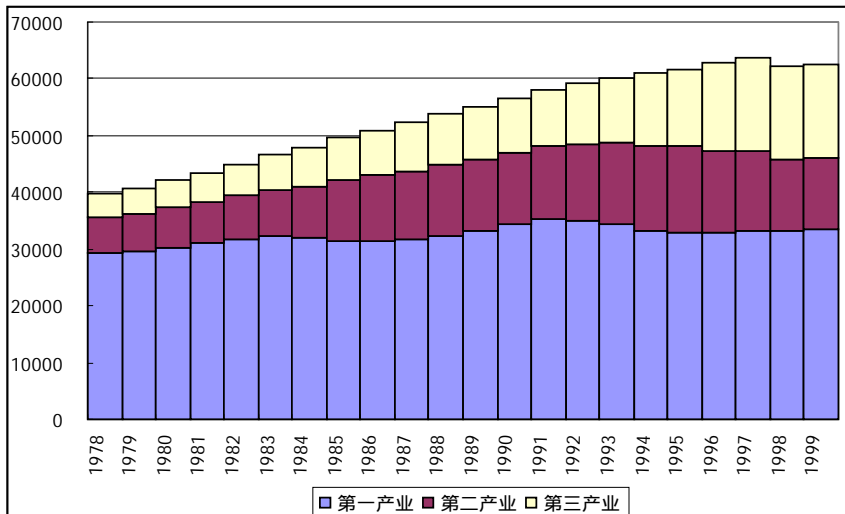


图 1 分产业就业人数变化（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1995-2000 年期间，共有 1400 万人失业，此外，未登记为失业人员的下岗职工几年来一直在 1000 万人上下徘徊，1999 年全国共有不在岗职工（含下岗职工和停薪留职人员）2155 万人。农村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劳动力，以及从乡镇企业退出工作的劳动力，尚未统计在失业或下岗数字中。这种就业困难导致一部分城市家庭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下降，甚至有些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状态，造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

经历了 90 年代后期最困难的数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初步得到回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物价停止下降趋势而趋于稳定，伴随着新的消费热点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以及投资需要增速加大，这一就业局面在 2000 年也开始有所缓解。

首先，从 2000 年开始，劳动力需求持续数年下降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主要行业 16000 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一项用来反映企业劳动力景气的指标，在 2000 年上半年已经开始明显回升，并呈继续提高的趋势。2000 年年末全国从业人员 7115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64 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 21274 万人，增加 260 万人。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全年通过多种途径使 361 万人实现了再就业¹。这种劳动力需求的回升与宏观经济结构性恢复增长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受“假日经济”需求推动的旅游业增长，以及居民其他方面需求推动的第三产业增长，就成为吸收就业的重要源泉。

其次，失业和下岗人员的补贴、救济等发放保障程度大大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比较稳定地得到改善。2000 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显示，对企业不在岗职工发放的生活费有大幅度提高，国有单位不在岗职工的生活费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32.2%，集体单位提高了 12.6%，其他所有制单位提高了 47.6%。发放的生活费水平上涨，使得不在岗职工的生活有所保障。此外，失业人员的保障程度也较高，失业保险制度逐渐完善。随着企业下岗职工在再就业中心呆满三年后，一部分下岗人员将转为公开失业，失业保险制度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包括养老金发放方式和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都加快了速度。2000 年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 10408 万人，月平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137 万人；有 10367 万职工和 3173 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²。居民对这些方面改革的预期不再过分悲观。在传统的就业体制下，企业雇用一名职工，就意味着要对其保障就业、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负责到底，形成企业的巨大负担，有时使得企业

¹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1 年 2 月 28 日。

²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1 年 2 月 28 日。

对于雇用劳动力望而却步。而上述改革明显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有助于提高企业进行生产要素替代，增加劳动力雇用的积极性，因而对就业状况的改善具有积极的影响，并在今后几年中都将具有刺激就业增长的积极作用。

回升中的劳动力市场需求，除了继续这次就业低潮之前的趋势之外，还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根据对 27 个城市 2000 年第三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¹，我们可以观察到对劳动力需求的一些特点。

首先，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处于滞后的状态，从而该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低。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该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比其他产业要大。这个要求已经表现在 2000 年的劳动力市场上。例如，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仅仅占全部劳动力需求的 2.8%，第二产业也仅仅占 23.1%，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占到 74.1%。而且，从市场上对新招聘雇员的需要，大多数是第三产业中的职业。如在需求数量最大的前 10 位职业中，基本上全部是第三产业相关行业中的岗位。

其次，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还反映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在过去的许多年中，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国有经济，这一趋势仍然在继续，并且表现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差别上面。与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所有制结构中地位相对应，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不足，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趋于缩小。例如，国有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全部市场上的需求中仅占 8.5%，集体企业占 9.4%，而私营及个体企业占 30.6%，股份制企业占 24.7%，其他非国有经济企业占 26.9%。

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相结合，也产生一些劳动力需求变化的特点。在那些产业结构比较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以及非国有经济占较大比重的地区，就业状况恢复得就比较好，而在那些产业结构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较严重，而且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地区，就业状况仍然不好。例如，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传统的重型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困难，非国有经济发展有待时日，所以就业恢复仍然落后于其他省份。在 2000 年全国减少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有 1/5 是这三个省份减少的。

第三，劳动力市场上对雇用人员年龄的严格要求，既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新要求，也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的新问题。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招工单位普遍对所要聘用人员的年龄提出比较严格的要求。在全部劳动力需求中，要求受聘者的年龄在 16-34 岁的需求超过 2/3，只有 11.5% 的招工单位没有提出年龄要求。一方面，这种趋势反映了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许多岗位对劳动者的技能以及技能更新可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常常表现在对年龄的要求上面；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保

¹此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所作。

障体系取代旧体制的过程中，养老、医疗等负担成为企业所要实际考虑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小这种负担的程度，雇用相对年轻的职工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正在初步走出就业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劳动力市场也继续发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可以从此转向乐观。保持就业持续增长势头，有赖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恢复、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迄今为止，上述几个方面尚不是可以完全乐观的。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形成中的特点、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现行的政府反失业政策进行评价，并试图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理解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必须结合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阶段性特点。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 50 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 80 年代改革以前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像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值比重提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转换发生的同时，以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为特征的就业结构转换却微不足道，即中国就业结构转换比产值结构转换来得更迟一些。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中的一个非典型化特征。并且，这一特征一直影响到目前的中国产业结构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来看这种非典型性特征。在表 1 中，我们选取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的一些国家（1997 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位第 65，选取的则是排位在第 60 到 69 之间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中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中国的结构变化是接近于典型化的，则城市化水平、农

业劳动力比重、农业产值比重和农业劳动生产力都应该与这些国家有类似的变化。但事实上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上述结构变化的指标上面都呈现出滞后的特点。由此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非典型化特征。

表 1 在比较中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美元, %)

国家	实际人均 GDP	城市化 水平	农业劳动力 比重	农业产值 比重	农业生产率
中国	3570	32	72	20	193
保加利亚	3860	69	13	10	6240
危地马拉	3840	40	52	24	1240
印度尼西亚	3450	37	55	16	481
牙买加	3470	55	25	8	1045
约旦	3430	73	15	5	2769
哈萨克斯坦	3290	60	22	13	-
拉脱维亚	3650	73	16	9	3870
巴拉圭	3870	54	39	23	2204
菲律宾	3670	56	46	20	780

【注】农业生产率系每个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农业增加值；除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1990 年数据外，其他皆为 1997 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9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 190-193、204-205、212-21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1998》，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8 年，第 465-467、478-479 页。

改革以前劳动力市场不存在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而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虞。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所以，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不会发生。

因此，改革以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表现为一种二元结构，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反差。这种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反差，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而是被分割的，相应地城乡劳动力占有的资源严重不均等。1978 年城市部门共有 9500 万职工就业，农村劳动力人数为 3.1 亿，两者劳动力之比为 3.2 : 1；而同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 4488

亿元，农业中仅有固定资产总值不足 950 亿元，两者资本之比率为 1：4.7。按照生产要素遵循提高边际报酬的逻辑流动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就业机会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均等。

既然改革以前城乡劳动力分割的格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一系列相应制度安排的结果，则随着改革的进行，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有所发育。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大多数并不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而是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 5000 万左右。

经过了大约 20 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图 2 显示 1998 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超过 20% 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 5 亿人，大约 1 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 5000 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看，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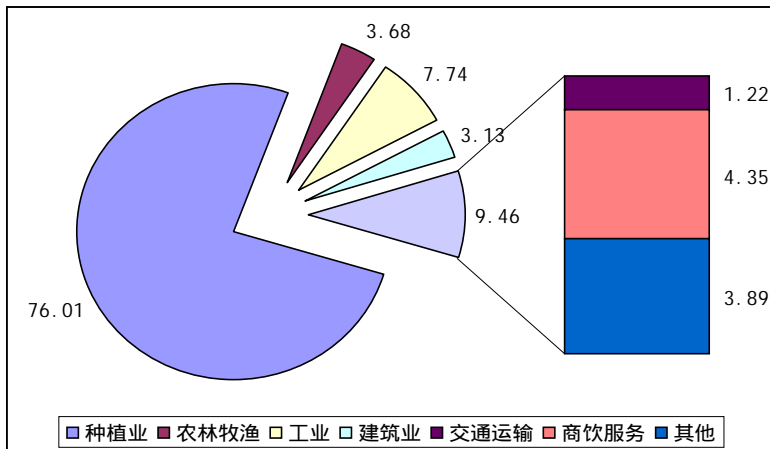


图 2 1998 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信息中心（2000）。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 1987

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惟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 1985-1998 年期间，国有企业雇佣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 70% 下降到 44%；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 26% 下降到 9.5%；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 4% 上升到 24%。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的这种下降中，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在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城市居民常常把失业、下岗等现象，以及在劳动力由市场调节情况下经常发生的就业现象，归咎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竞争，而通过各种方式寻求政府的保护。由于城市政府受到本地居民要求就业保护的巨大压力，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排斥外地劳动力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现在，一方面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并未打破传统的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城市形成了主要在国有经济部门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以及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因此实际上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双二元劳动力市场。

三、转轨时期劳动力供给特征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口增长常常被等同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中实行了比较严格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 10%，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既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通过一系列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绩效。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可能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

从业人口是全部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构成变化主要受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劳动参与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中略有增大。16-59 岁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在 1990-

1996 年期间一直在 61%-62%之间徘徊，随后提高到 1999 年的 63.2%¹。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一个时期，直到老年化进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超过这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才会趋于下降。而对人口及其年龄结构的预测表明，这种人口转变趋势将在 21 世纪得以继续。

预测表明²：首先，少年儿童人口（0-14 岁）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逐步缩小；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15-59 岁)在 2010 年前后达到其最高点之后，将趋于下降；最后，老年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并在 2010 年前后开始迅速提高。在预测的区间内，老年人口比重提高的趋势将不会停止。这个预测结果显示，整个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自上而下挤压型的变化趋势，即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随之下降，并相应挤压少儿年龄组人口，使其比重进一步减小（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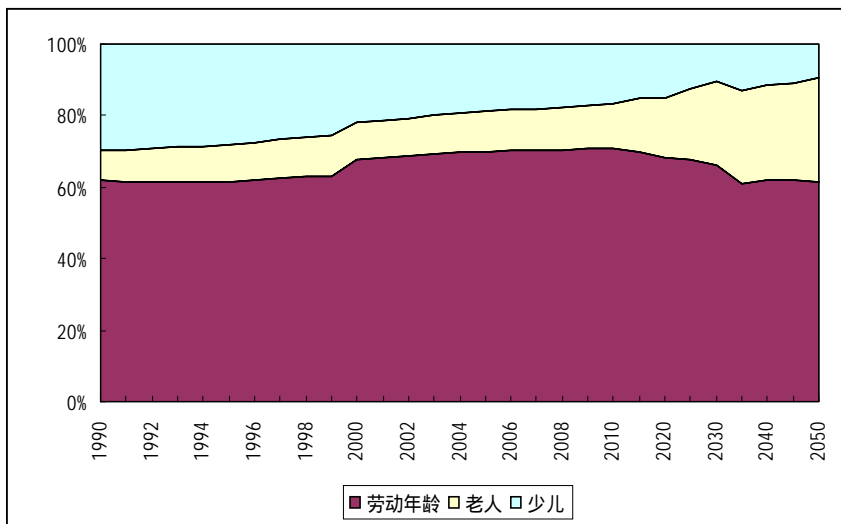


图 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报告《人口政策前瞻性研究》，2000 年。

由于城乡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进程不尽相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人口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既然城乡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反映在人口结构变化的特征上。从表 2 可以看到，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呈现少儿年龄人口比重减小和老年化加快的趋势。但是，城市和农村在上述两个主要人口结构变动上的进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城市与农村相比，更具有未来的人口结构特征；在农村劳动年龄人

¹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各期数据计算。

²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报告《人口政策前瞻性研究》，2000 年。

口比重仍然略有提高的同时，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有下降趋势；城市老年化进程快于农村。

表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城乡比较 (%)

	0-5岁		6-15岁		16-59岁		60岁及以上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1990	9.4	13.0	14.4	18.6	68.0	59.6	8.1	8.7
1991	9.8	12.9	14.5	18.3	65.9	59.8	9.8	9.0
1992	9.0	12.4	14.9	18.9	65.6	59.9	10.6	8.8
1993	8.3	11.7	15.4	19.5	65.6	59.9	10.8	8.9
1994	8.0	11.1	15.2	19.4	65.7	60.1	11.0	9.3
1995	7.6	10.2	15.5	20.1	66.3	59.7	10.6	10.0
1996	6.8	9.2	15.3	20.6	65.9	60.2	12.0	10.0
1997	6.6	8.6	14.8	20.7	66.6	60.6	12.1	10.1
1998	6.2	8.1	14.7	20.3	66.6	61.2	12.5	10.4
1999	6.0	7.8	14.4	20.2	66.8	61.5	12.8	10.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各年。

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人口结构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相对于人口过程，经济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中近期变化特点，至于与经济福利有关的宏观经济现象，其短期含义更突出到几乎与人口结构变化无关的程度。对于一个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非常多样化的与可变的，并不必然受到人口变化的制约。

从上述人口变化特征来看，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基本上是稳定的，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影响短期的宏观经济景气；另一方面，城乡劳动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长期里可以互相抵消一部分影响，从而事实上不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的明显差别。而且，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的特征，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最近若干年出现的，也不是改革以来出现的，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具有的长期特征。它不会转瞬即逝，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就业形势的宽与松，固然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所致。然而事实证明，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严峻的就业困难，不是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

四、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

中国目前的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把就业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但是，反失业政策的核心是消除严重的失业现象，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前面的分析，以及对过去政策的估价与反思，可以提出几点在制定反失业政策时必须注意以及需要修正的方面。

首先，反失业政策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较好的就业状况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较充分利用，而生产要素的更充分使用有赖于经

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高速度。中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由来已久，但改革开始后的 80 年代，一方面城市企业中释放出大量的冗员，另一方面农业中也转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其原因就是因为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特别是高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消化了大规模增加的额外劳动力。可见，扩大需求是反失业政策最有力的手段。

继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反失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资本过于密集的产业结构，本身就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90 年代前中国经济对大量劳动力的吸收，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得益于通过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向劳动密集方向的调整。此外，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于其发展阶段而言仍然偏低，该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余地，而且，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吸收劳动力的潜力很大。2000 年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信息已经显示出，在各个产业中，对就业需求最大的是商业和餐饮业，占市场上全部劳动力需求的近 31%。如果加上社会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整个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超过了全部需求数量的 74%。

在改革以来的 20 余年中，无论从产值比重还是从就业比重看，农业显示出了相对份额下降的规律，而工业也比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一些，第三产业增长最快。在 1978-1999 年期间，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 100，第二产业增长率指数为 163，第三产业增长率指数为 221；若以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为 100，则第二产业增长率指数为 187，第三产业增长率指数为 311。这一特点在就业恢复过程中继续表现出来，是一种健康的结构调整表征。

其次，反失业政策不应当妨碍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是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矛盾的最重要机制，其是否具有弹性决定了这种调节的效果。目前的反失业政策，特别是许多城市地方政府的反失业政策，具有阻碍劳动力市场继续发育的倾向。例如，许多大中城市的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外地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公布了限制外地劳动力进入的行业和岗位，加强了户籍管理，并采取其他措施以减少外地人口的流入。这种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本地职工的就业不受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但却妨碍了作为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其结果不仅是通过降低农民收入而导致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缩小，而且使得城市传统就业机制继续保持，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功能不能发挥。在生产要素市场功能不健全的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 and 持续的经济增长都会受到损害。对改革以来 20 年经济增长源泉的经验分析表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达 20%。

另外，把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摩擦性失业，用政策措施掩盖起来，或者让企业承担保护这部分失业者的做法，也是妨碍劳动力市场功能发挥的。一方面这种政策抑制了企业调整技术结构，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提供的积极性，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力需求；另一

方面也使城市职工产生对政策依赖，不能够而且不愿意在新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而维持了旧的就业体制。

最后，应该放弃主要从缩小劳动力供给角度入手的反失业政策。如前所述，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不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景气，也不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短期影响。而那些着眼于缩小劳动力短期供给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就业问题，如提前退休一类的办法还会加重未来对职工养老的社会负担，或者使一部分城市人口限于相对贫困状态，都会导致体制性后遗症。

我们的结论是，任何阻碍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政策，都对增加就业有害无益，换个角度说，有助于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吸收从而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是那种推进经济增长，并且发育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如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目前中国形成了一个双二元劳动力市场。

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含义是除了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外，城市内部也形成了性质不同的两个劳动力配置机制。主要在国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仍然具有传统体制的基本特点，职工工资的决定是制度性的，意味着相对于中国目前仍然具有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的特点，这个部门的工资水平过高，抑制了劳动力需求。而在非国有经济中，工资水平由市场调节，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的国情。由于两种劳动力配置机制的同时并存，劳动力市场发育意味着工资水平的调整，并相应地影响就业需求。此外，经济增长在任何时期都是就业增长的推动器，在目前的中国也不应例外。因此，我们预期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减少，以及经济增长率提高，都会对就业增长产生积极的效果。

为了检验这个结论，我们利用 1978-1999 年分省数据进行回归，以观察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对就业的影响。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ln labor = \beta_0 + \beta_1 \ln gdp + \beta_2 \ln wage + \beta_3 TI + \beta_4 D_j + \varepsilon$$

式中，labor 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wage 为职工年平均工资，单位为元；TI 为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百分比，用来作为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 β_i 为待估系数， $i=0,1,\dots,4$ ；

D_j 为分省的虚拟变量， $j=1,2,\dots,30$ ； ε 为误差项；gdp 和 wage 都是利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78=100)消除物价水平因素的影响；ln 表示我们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估计结果列于表 3 中。利用最小二乘法 (OLS) 得到的回归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可以带来 0.93% 的就业增长；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百分比提高 1%，可以带来 0.01% 的就业增长；另一方面，工资每上升 1% 使得就业降低 0.71%。

表 3 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说明	变量代码	因变量 (lnlabor)
GDP 的对数	lngdp	0.93 (31.06)**
工资的对数	lnwage	-0.71 (17.40)**
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百分比	TI	0.01 (7.12)**
截距项	Constant	5.79 (29.16)**
观察值个数	Observations	660
拟合优度	R ²	0.98

注：1、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2、*代表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5%，** 代表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1%；

3、为了便于文章简洁性，本文将分省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略去。

五、影响未来就业形势的主要因素

劳动就业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问题方面，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就业政策或反失业政策，也不应该只是单一取向的或手段单一的。概括来说，2001 年以及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将会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分析这些因素并揭示其对于就业增长的实际意义，有助于我们提出正确的政策目标和手段，由此也可以预测未来劳动就业的可能情景。

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回升的端倪，但如果不能保证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的稳定增长，特别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在走出了短缺经济后的今天，就无法根本破解将会反复出现的需求不足的难题。过去已经有多多年，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使得占全国人口近 70% 的农村人口只占全部消费的较小比重，严重地抑制了国内需求。顺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和加入 WTO 的挑战，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育劳动力市场，帮助农民转移出来，都会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宏观经济的景气，以及就业的扩大。

其次是中国加入 WTO 的预期和实际影响。加入 WTO 对中国经济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其现阶段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在那些不再能够寻求保护的产业，中国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方向的调整，进行生产要素的替代，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例如农业从完全的粮食自给自足到生产更多的经济作物，就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规避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将获得加快增长的机会。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应对挑战，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新的就业机会的获得应该多于传统就业机会的丧失。

第三，与 WTO 挑战相关联的是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国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为我们提供较大的潜力，通过发展这个产业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国有经济除了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可以以同样的资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特点外，还更加善于寻找产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随着中国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非国有经济将成为吸收就业的主力军。所以，未来就业状况如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最后，治理失业问题和扩大就业，归根结底有赖于经济改革的深化。目前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对于这一改革最重要的两个领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会解除企业的政策性社会负担，从而按照市场原则雇用劳动力，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劳动力的实际稀缺程度以及相对价格，既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帮助产业结构的调整。户籍制度对于诸多妨碍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政策来说，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制度。只有对之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够彻底消除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障碍。而一旦这个制度不复存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有助于消除城市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扭曲，从根本上也是有利于城市居民增加就业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1 年 2 月 28 日。
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9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
3.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报告《人口政策前瞻性研究》，2000 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1998》，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8 年。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6.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